

台湾

幽默

散文

柏杨幽默散文赏析

析丛

之三

雷锐

刘开明



柏楊幽默散文賞析

台灣幽默散文析叢之三

(桂)新登字03号

柏杨幽默散文赏析

雷 锐 刘开明 编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51,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0 册

ISBN 7-5407-0895-5/I·634

定价: 3.95 元

论柏杨散文的幽默特色

(代序)

六十年代的台湾，禁锢在像罐头一样严密的蒋氏父子高压政策之下，文坛上喧嚣着反共声浪、飘荡着靡靡之音。偏偏在这时，有一枝怪倔的笔，时不时朝着遮饰现实的霓虹灯、五彩球戳去。这种捣乱虽然不会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垮台，却也不能见容于当局。因此，尽管笔的主人并非共产党，也遭到了野蛮的囚禁。可是，这枝笔一旦脱困，又重新发出战斗的热力，继续向社会的丑陋面冲击。握着这枝笔的是一只充满韧劲的手，这只手属于一位笔名由两种同样傲岸韧强的树——柏、杨组成的作家。

柏杨，原名郭立邦，后改名郭衣洞。祖籍河南辉县，1920年生。幼丧母，后随父迁居开封。儿时受后母虐待，不得温饱，从小便感到人世间诸多

不平，身上天生的“河南人的毛驴性格”（柏杨语）更加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刚满18岁、升入高中二年级的柏杨投笔从戎，考入河南军事政治干训班。1938年被送到武昌受训，集体加入国民党。后从事三青团工作。1942年辞职。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东北大学。抗战胜利后，任过《东北青年日报》社社长，私立辽东学院副教授。1949年去台湾。做过中、小学教员，成功大学副教授，《自立晚报》副总编，“国立”艺专教授。1951年参加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征文，开始小说创作，陆续出版《打翻铅字架》、《天涯故事》、《挣扎》《旷野》、《怒航》等。六十年代，开始杂文创作，影响极大，产量愈益丰富。著名代表作有《玉雕集》、《倚窗闲话》十集、《西窗随笔》十集、《牵肠挂肚集》、《云游记》、《猛撞酱缸集》等。1966年任平原出版社社长。不久因在其前妻、诗人倪明华主编的《中华日报》家庭版《大力水手专栏》上，刊登了一幅讽刺蒋氏父子的漫画，被当局于1968年3月逮捕入狱，死刑起诉，以叛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后改为8年），开除国民党党籍。刑满出狱后，又被软禁1年多，至1977年始获自由。柏杨服刑期里饱受摧残，被打断一条腿，妻子也因之离了婚。但他并未就此消沉，在狱中仍坚持研究写作，写出《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

稿。出狱后，与女诗人张香华结婚。又将《资治通鉴》作翻译改写，编成《柏杨版资治通鉴》72册。与此同时，继续从事杂文写作，出版了《活该他喝酪浆》、《早起的虫儿》、《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你受了什么诅咒！》等。柏杨著作繁富。他以小说起家，广涉诗歌、报告文学、历史文学，但以杂文影响最大。1985年12月，台湾《时报杂志》将柏杨列为该岛“最畅销的十位作家”之冠，原因主要就在于他的杂文。而在大陆，柏杨的名字又因其杂文选集《丑陋的中国人》的出版和引起的论争而广为人知。

柏杨也对杂文格外青睐。他曾说：“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可以直接插入罪恶的心脏。”（《丑陋的中国人》）可知柏杨非常看重这种散文中的特殊分支的战斗性。他是用杂文作武器，向社会的黑暗面、人性的丑陋面作直接斗争的。阅读柏杨的杂文，我们往往从中可以看到隐约显现的刀光拳影，听到或抑或响的斥叫低号。而同时，我们又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战斗的气氛，又大都是披着一件嘻笑佻狂的外衣，以致他的杂文乃至其游记散文，都弥漫着一层或浓或淡的幽默味道。那种机智的微笑，不时荡漾在字里行间。当然，部分散文幽默之味浓郁一些，令人自始至终笑不可抑；部分杂文幽默之味轻淡一些，给人领略到的不

过是偶然的莞尔，而某些散文中的笑声差不多已逸出幽默的范围。但无论如何，幽默作为柏杨散文的显著特色之一，是毋庸置疑的。本书选择的20余篇散文，冠以“柏杨幽默散文”赏析，不过是百中取一。而且限于对其作品所择不全，这本小册子的选文也未必就是柏杨散文中幽默特色最显著者，我们只希望通过以下这些作品的赏析，能让读者对这位颇有争议的作者散文的幽默特色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幽默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人类文明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它一向是世界文化的共区。幽默是属于喜剧范畴的美学概念。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humor，原为液汁之意，医学术语。古希腊的医生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特别的液汁，当其失调时便会引起一系列疾病，需要用放血或其他方法排出体外，才能使疾病痊愈。其所以借来作美学术语，大概是“幽默”这种艺术表现方法也有使人身心舒畅平衡的功效。“幽默”是汉语古已有之的一个旧词，本义是“寂静无声”。“五四”以后，林语堂最先根据humor的英语译音，定为“幽默”，并于三十年代加以大力提倡，“幽默”才引起文坛的瞩目关注。关于“幽默”的定义，目前国内有多种解释，意义相近但表述不一。笔者认为幽默是一种特殊的喜剧形式，一种轻快、诙谐而意味深长的特殊笔调，一种风趣而机智地思考问题和表述问题的

方法。它的本质是通过“神形倒错”等方法来表现美压倒丑的优势，其表现效果是一种轻松而有深意的笑。在现代语义上，幽默和诙谐、滑稽、讽刺很相近，但又有着层次上的区别。鲁迅对此就分得很清楚。他认为幽默决不是一种“单单的玩笑”；如果把它看成“说笑话”、“讨便宜”，那是一种堕落（《从幽默到讽刺》）。幽默也不是滑稽，二者“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滑稽”例解》），可知滑稽在感情上的欠缺。幽默和讽刺联系最近，但又各有其独特本领：讽刺是对可笑性事物的一种否定性的审美评价和嘲笑，多用于批评否定；幽默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于肯定赞成。特别是讽刺味道比较辛辣，方式比较直接；幽默则较为轻松，方式比较迂回。幽默和诙谐确为接近，但幽默显得更高雅一些，诙谐有时不免沾上油气。总之，幽默与诙谐、讽刺、滑稽都有笑的效果，但幽默层次更高一些，更为机智、含蓄、分寸合度。所以在艺术的世界里，把“幽默”推崇为较高的境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同的幽默作家，其作品有不同的幽默色调。柏杨散文的幽默，表现出一种野俗的风格，散发出一种辛辣的味道。

丰富广博的学识、敏捷多变的思维，使柏杨能取例于古今中外，笔涉人类生活各个领域，小至日

常生活的排队穿鞋，婚丧嫁娶，大到国政外交，时事新闻，无不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而不论大题材的幽默也好，小题材的诙谐也好，作者笔锋底下总是蕴含着凝重的思想内容。1980年元旦，柏杨仿南唐词人冯延巳的《长命女》一词，写出自己的八十年代七大愿，幽默地篡改词牌名，调寄《长命男》：

“春日宴，香烟一支咳一遍，磕头陈七愿：一愿取消籍贯，二愿分而食之，三愿直呼名字，四愿不再托人带东西，五愿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六愿斑马线安于泰山，七愿中国成为真正的礼义之邦。”这七愿中除五、七愿直接与国家尊严、民族形象有关之外，其他都是微末小事。看起来似乎是纯粹开玩笑，但取消籍贯却和砸碎专制政体有关系，分而食之与消灭中国人的个人主义有关系，直呼名字与民主平等有联系，不托人带东西与消除自私心理有联系。斑马线（即横穿马路之人行道。——笔者）安如泰山与尊纪守法有联系。这样一来，小事便不再小，小事中有着大道理，幽默里有着严肃的内容。黑格尔说：“真正的幽默，要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于无足轻重的东西之中见出高度深刻的意义”，从而“放出精神的火花”（《美学》第二卷）。鹤见佑辅说：“幽默是诉于我们理性的可笑味。”（《思想·山水·人物·说幽默》）柏杨的幽默能注意保持其严肃的思想内容，是深得幽默之灵魂的。正因乎此，尽管柏杨的幽默常常夹

以滑稽、油滑、俗气，却也大致能保持幽默的本质，从而与那些低级趣味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具有一定的甚至颇高的审美价值。

综观柏杨的散文，大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作者憎恶独裁的黑暗现实，愤慨社会中的种种丑陋肮脏，讨厌生活中的卑鄙龌龊，以及人性中的缺陷弱点。这些感情在胸中翻腾，性格率直的柏杨很难控制住它们的奔放。但身为一个作者，他也懂得“文贵曲笔”的必要。于是，他蘸起幽默的色彩，试图用来掩饰自己的感情。只是这种掩饰并不很成功，幽默中依然时不时难以抑阻地透露出明显的愤厌。1982年，柏杨游历欧洲，写下多篇散文，其中有不少文字是对德国纳粹政治、血腥罪行的抨击。大概是要保持游记的轻松，又习惯于用诙谐的手法吧，他依然在希特勒及其党徒身上点上幽默的笔触。他写道：“希特勒先生怕死怕得要命，他阁下躲在万无一失的防空洞里，英勇的发号施令，要求所有德国人都为第三帝国战死。死光了更好。”《卧像·吊像》一开头就用这种幽默的调子。“怕死”与“英勇”同时存在一个人身上，“所有德国人”都“死光了更好”，第三帝国又怎样建立？这些明显充满矛盾的用语正是幽默地嘲笑了希特勒的愚蠢。文中提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两位大独裁者“层出不穷的保证和誓言，比自来水都方便，只要一扭喉头，就哗啦哗啦，倾盆而出。”说他们的

磁性声音，在空中激荡，……扣人心弦，不由心向往之。”类似这些“赞美”和调侃的句子触目皆是。初看之下真使人担心这样会“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鲁迅：《〈论语〉一年》）但再一细看，就感到无处不跃动着强烈的义愤。在这些幽默的句子中，含有义正词严的斥责，有对独裁者反动伎俩的揭露，又有对糊涂虫们的嘲弄。文章最后建议为希墨二凶塑像：一卧伏于防空洞，一吊悬绞刑架，也是在幽默中包含了严肃的警醒后人的内容。由强烈的主观色彩产生的鲜明的倾向性，使柏杨散文中哪怕近似油滑的幽默也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性。上文所举的对希特勒等独裁者的文章如此，对纳粹集中营的描写如此，对台北官场上的官崽们的描写如此，对一切生活中人性中的丑陋面的描写也如此。

柏杨杂文著名的一大内容，便是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挖掘。这些劣根性之汇集产生地，被柏杨幽默地用一个名词来比喻：酱缸。“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固力极强的浑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主义长期斲丧，使人类特有的性灵僵化和泯灭的浑沌社会。”（《死不认错集》）正是从这个“酱缸”里，生出无数“产品”：像“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窝里斗”，“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肤

浅虚骄”，“脏、乱、吵”……等等。柏杨对这些中国国民劣根性的种种表现深恶痛绝，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大声疾呼要予以扫荡根除。他干脆将一个杂文集命名为《猛撞酱缸集》。“猛撞”二字，正可见出其态度之激烈粗鲁，主观色彩之浓。于是，从柏杨对形形色色的“丑陋的中国人”的幽默中，读者们闻到了火药气息：

“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

“中国人口太多，十亿张大的口，连喜马拉雅山都能吞进去。”

“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一条虫，甚至连虫都不如。”

“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丑陋的中国人》）

忧愤之色已突破幽默的薄彩。作者在嫉愤中国人的虚骄，盲目自大，嫉愤中国人的“多子多福”观念，嫉愤中国人的自我内耗，嫉愤中国人明知是错却死不认错或佯装没错。……这些弊端确是积之既深且厚，没有愚公移山的顽强精神和代代继承的努力，是不容易克服的。作者又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细致，急躁的情绪便随时浮现，即使是较强的幽默感也要被带上一种粗重之气，使人感到并不轻松。

读柏杨的杂文，透过那些幽默的叙述描写，字里行间总可以隐约窥见作者蹙眉疾首的模样，甚至磨拳擦掌的架势。有人说柏杨的文章很像在吵架，作者也不掩饰这点。不少时候，他干脆就从铅字背后闪身出来，跳入和黑暗丑陋斗争的战场。在《分而食之》一文中，他幽默地反对中国人相聚而食的习惯，因为这是病菌得以自由“聚会”、“联欢”、“交换心得”的好地方。笔尖一扭，提起他在台北肺结核防治中心见到的一件事：一位病人抱着孩子来就医。医生说，既然孩子的母亲已患肺结核，为什么还要全家共同进餐而不让病人分食？这样全家都被传染上了。病人说：“我们于心不忍呀。”言下之意是分食会给孩子的母亲增加思想负担。写到这里，作者突然猛插一笔：“我在旁就想斜刺里给他一脚。朋友看我又要惹事生非，猛的把我拉开，几乎拉个嘴啃地。”“几乎嘴啃地”的滑稽模样是可笑的，可想“给他一脚”的动作则又是充满义愤的，主观色彩极强。《自己争气，莫一味把人怨》一开头列举了两个洋人瞧不起中国人的例子，怀疑凡到美国旅游的中国人都有移民倾向。气得当事人“浑身发抖”，差点要“跳高”。幽默之中，已含被侮辱的愤怒；紧接着作者干脆直书：“这不过是两个并不突出的例证，突出的例证举起来，更教人吐血。”“吐血”二字，虽然也不无一点夸张的幽默，却更多的是真实的愤慨。在此类文章中，柏杨

常常写到自己或别人“气死复气活，气活再气死”，写自己听到不公平的事时“一跳而起，要不是朋友拉得紧，一拳下去，我老人家又要坐牢矣。”（《自己争气，莫一味把人怨》）看到这幽默的描写，读者一面为作者“不文雅”的动作哑然失笑，一面也感到了他行文中的强烈主观色彩。一种“野”气，容易感染人，但幽默应有的含蓄性便因之减弱了许多。

这种强烈的主观色彩，往往就容易使柏杨笔下的幽默色彩变调，犹如青椒变红，那辣味就明显地超出了原先的涩甜。幽默也常常变为讽刺，《二抓牌》一文中，作者不满于台湾官场上的黑暗，但可能又忌惮于先前触怒当局被坐牢的教训，只好借助于幽默的掩饰。他先写官员们“伸手二抓”，而“‘钱’和‘权’，看起来虽有分别，实际上固阴阳调和，老子一气化三清之物。”因此“抓到了钱，就等于抓到了权。抓到了权，也就等于抓到了钱。”将这二者和老子的阴阳论硬凑在一起，风马牛不相及，但正是幽默的特点。只是行文下去，作者胸中的愤怒渐渐泛于言表，幽默便慢慢褪于色：“权和钱既不是正常到手，而是张牙舞爪抓来的，就漪欬盛哉。”

“张牙舞爪”四字的辛辣味道，是“漪欬盛哉”的调侃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接下去，干脆就是讽刺占了主位：“于是你也抓，我也抓，无人不抓，大号二抓牌有大号的抓法，小号二抓牌有小号的抓法，重崽级二

抓牌有重崽级的抓法，轻崽级二抓牌有轻崽级的抓法，一个个两眼发直，汗流浹背……。”将统治阶层的丑态作了尖锐的讥讽和嘲弄。后文又拿他们与教师阶层相比较：“官崽们唱黄梅调唱顺了嘴，自己躺在席梦思床上，而教别人‘卧薪’卧到木板床上。自己开冰箱喝洋酒吃火腿，而教别人‘尝胆’吃凉水泡窝窝头。”强烈地讽刺了当官阶层满口高调而满肚自私，不平之气简直要破纸而出。正因为柏杨这类讽刺现实的文章写得太多，幽默的外衣又遮不住那愤愤的情绪，自然也就触中了当局的痛处。1968年，柏杨在台湾《中华日报》家庭版开辟了一个《大力水手专栏》，其中刊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父子二人合购一个小岛，在岛上建立了王国，并由父子二人竞选总统。这幅漫画让台湾当局气得咬牙切齿。柏杨也被以“侮辱元首”、“通匪”罪名关入监狱。十多年后，柏杨回忆起这件事，说：

我当时并没有想搞什么影射，但在潜意识中却有不满意蒋家父子的东西。……我在蒋经国领导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过务，切身感到蒋经国神经过敏得很。那时有一部西方影片，描写拿破仑被囚于一个海岛，他的情人去探监……蒋经国说“这是讽刺我们退居海岛呀！”这部影片于是被禁演了。……那时台湾警察局门旁都挂着一块牌，上面写着“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你一个警察，要充作老百姓的

师长，你有多大学问呢？“作之君”，你想当皇帝吗？“作之亲”，你还要当老百姓的爸爸？我用杂文讽刺这种畸形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共鸣，以致“三作牌”成了警察的代名词，所以警察把我恨之入骨。久而久之，官方对我产生一种印象：这个人有反政府倾向。我整天生活在风声鹤唳之中。所以“大力水手”事件不是偶然发生的。

——陈漱渝：《他在争议中保持自我》

由此可知，强烈的主观色彩，不仅使柏杨的幽默无法遮掩他文章中的芒刺辣味，而且这种芒刺还刺中了黑暗势力的痛处，使之龇牙咧嘴，杀伤力是不小的。倘若只是纯粹的幽默乃至插科打诨的油滑，台湾当局也许还能故作宽容地忍耐，偏偏结果又并非如此！从表现手法的效果来说，柏杨笔下的幽默常常夹着辛辣的讽刺。有时情之所至，幽默干脆就不得不自然让位于讽刺。柏杨说：“专制产生讽刺，民主产生幽默。……迫害产生讽刺；越讽刺，越迫害；越迫害，也越讽刺，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养养幽默感》）这正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身居那样的政治环境，又是一副天生鲠直脾气。柏杨笔下的幽默是很难纯粹的。

同样，由于强烈的主观色彩，柏杨的散文中常常出现明显的偏激性，以致他的幽默也时时带上片面的缺陷，有时还产生相反的效果，幽默中包含的

宽厚心肠良好愿望也难以让人觉察。其实，柏杨“猛撞酱缸，只是希望撞个窟窿，使流进一点新鲜空气，和灌进一点凉爽清水。”（《〈死不认错集〉序》）在历数中国传统的种种弊端和现实中国的种种缺陷时，自己也“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肺”（《丑陋的中国人》）；在看到落后民族的衰弱时，也担心地联想到中华民族的现状：“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的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同上）平心而论，柏杨“这个‘糟老头’的基本出发点却是‘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责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满现状，而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深感叹惜！”（严秀等：《护短与爱国》）但是，这种强烈的主观情绪在宣泄的时候，却常常有使人误解、曲解的副作用；而幽默又正是这种渲泄的渠道之一。因此，当我们一方面觉得他将充斥着种种病态现象的中国社会幽默地喻为酱缸，陈腐的传统文化幽默地比作酱缸文化时，确实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这种说法未免太过于以偏概全，而将维护中华传统的人一概讥为“酱缸蛆”又未免太横蛮了些。这样，那些本来带着幽默的提法，都差不多失去了其可笑的意趣。柏杨行文的习惯，往往用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笔调，运笔流利爽快，一股愤世嫉俗的激情犹如开闸之水，奔流直泻，滔滔不可抑止。这样一来，语言常